



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高崇文

摘要:刘秀在原郡县洛阳城基础上,按都城礼制规划理念进行了增建。南宫大朝居中,左右分立庙和社,正式形成都城的“左祖右社”布局。庙则改西汉分散陵庙制,实行诸帝神主一庙“共堂”的集中庙制。南宫四面辟门,其分别名青龙、白虎、玄武,南门名端门,有似周正寝“路寝”门,这些均是阴阳五行观念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端门前大道,通过南垣平城门直达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大朝正宫之南的礼仪御道,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各具独特建制而分立,明堂用于祭祀五帝,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辟雍用于举行射礼、养老礼,太学为教授经学,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宣教礼仪的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已成历代都城之定制。东汉洛阳开启了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后世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东汉都城洛阳;左祖右社;明堂;辟雍;太学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2-0048-09

东汉洛阳城的前身可追溯到西周成王时兴建的成周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周敬王追述成王兴建成周之事:“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也记有成王“宅于成周”之事:“唯王初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裸自天。……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1]成王将成周视为天下之中,以治理天下之民。东周时期,敬王再次扩建成周,“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请城成周”。杜预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2]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初置三川郡”于成周^{[3]219}。秦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置洛阳县。西汉初刘邦曾一度定都于洛阳,其部下娄敬等人认为“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4]58}。刘邦乃西都长安,但洛阳仍是西汉政权控制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并改三川郡为河南郡,洛阳为河南郡治。刘秀于建武元年(25年)进驻洛阳,洛阳成为东汉王朝的都城。

一、东汉都城洛阳的营建

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勘查表明,周之成周、秦汉之洛阳位于今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经对故城城垣的试掘,已发现西周城址、东周扩增城址、秦代扩增城址的城垣。西周城址的城垣呈方形,东周向北扩增,秦代向南扩增,整个城垣呈南北长方形^[5]。刘邦都洛阳时间短暂,不会对洛阳进行营建。更始帝刘玄欲都洛阳,遣刘秀整修洛阳^{[6]9},此也应是就原有官府进行修整。刘秀于建武元年进驻洛阳,“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6]25}。洛阳成为东汉的都城。洛阳之名,乃以地处洛水之阳而名之,刘秀定都于此,因汉为火德,忌水,便改“洛”为“雒”。《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洛阳”云:“鱼豢云汉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鱼氏说,则光武以后改为‘雒’字也。”故东汉称“洛阳”为“雒阳”。

收稿日期:2022-12-30

作者简介:高崇文,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0),主要从事战国秦汉考古研究。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为了增加作为都城的重要礼制建筑要素,刘秀在原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增建:建武二年(26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建武五年(29年),“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建武十四年(38年),“起南宫前殿”。建武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初立北郊,祀后土”。

经建武年间刘秀对洛阳城的营建,洛阳作为都城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东汉都城洛阳考古发现与布局

东汉灭亡后,洛阳城又被曹魏、西晋、北魏作为都城沿用,故常称之为“汉魏洛阳城”。由于此城经数代改建、扩建,虽经历了长期的考古工作,但目前发现的东汉洛阳城遗迹的考古资料仍十分有限。所以,研究者多结合文献记载对东汉洛阳城进行复原与研究(图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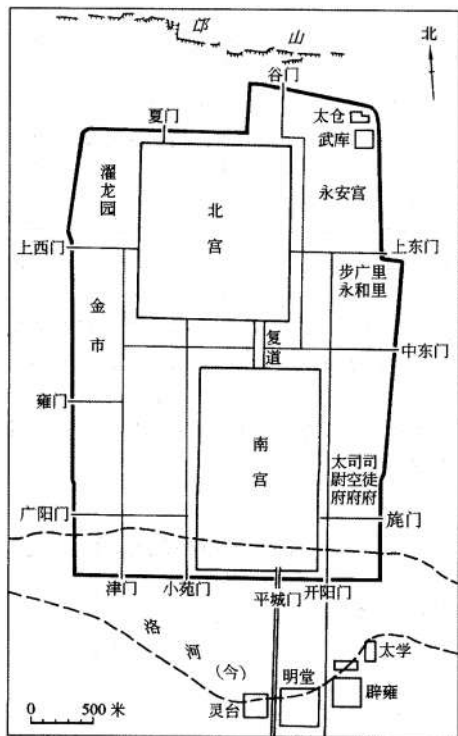


图1 东汉洛阳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引自徐龙国制图)

(一)城垣形制

东汉洛阳城的平面形状呈南北长方形。据

勘测,北城垣全长约2523米,西城垣残长约3500米,东城垣残长约3895米^[7]。南城垣已被洛河改道冲毁而不存,但根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汉官仪》又载“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可推断南城垣的大体位置当在今洛河河道内。

(二)十二城门

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勘查得知,东汉洛阳城有十二城门,东垣三门,西垣三门,北垣二门,南垣四门。其城门名分别为:东墙自北而南为上东门、中东门、旄门,西墙自北而南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北墙自西而东为夏门、谷门,南墙自东而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8]3610-3611}。

(三)宫殿

南宫和北宫是洛阳城内两组主要的建筑群。南宫在西汉初就已存在,刘邦最初便是定都于洛阳南宫。《史记·高祖本纪》载:“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高祖置酒洛阳南宫。”《正义》引《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这说明在秦时洛阳城就有南、北宫。光武帝刘秀初进洛阳城,就住在南宫的却非殿。研究者对南宫的具体位置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定位在都城的南半部略中位置。关于北宫,《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60年)“起北宫及诸官府”,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北宫成”。看似是明帝时新建北宫,但《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此应是明帝在秦时的基础上新改建北宫。研究者一般将北宫的位置推定在都城北半部略中处。

文献记载,洛阳城内还有东宫、西宫、永安宫等^②。据袁术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记载,东西宫应在南宫之内。永安宫在北宫外的东北部。

(四)宗庙社稷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续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刘秀于建武二年以左祖右社的方位立高庙和社稷,肯定是在南宫的东西两侧。目前宗庙和社稷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但李贤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此为后人注释,是否属实,难以确定。

(五)三公府、武库、太仓

《续汉书·百官志》“太尉”注引《古今注》:

“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空、司徒府开阳门内。”又引《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据此,三公府应位于开阳门内南宫苍龙门东部。武库、太仓位于城的东北隅。

(六)城南郊礼制建筑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李贤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光武帝纪》载建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李贤注引《汉官仪》曰:“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明堂、灵台、辟雍,合称“三雍”。1930年曾在城南大郊村发现晋武帝三临辟雍的纪念碑,后又发现碑座,可证“三雍”遗址位于城南大郊村一带^[9]。这些礼制性建筑遗址经考古勘查和发掘已得到证实。

(七)南北郊坛

刘秀于建武二年在洛阳城南修建了南郊坛^③。关于南郊坛的建筑形制和祭祀对象,《续汉书·祭祀上》记载比较详细:是一圆坛,双重,有八(陛)条登坛阶道。坛外有三重围墙,四面各有一门。祭祀对象有天地、五帝、日月、北斗、五星、中宿五官、二十八宿、五岳、雷公、雨师、风伯、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等,累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建好七年后,又增加了高祖配祀的制度。今汉魏故城南郊仍有“大郊村”之名,有可能是南郊坛的位置所在。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立北郊坛于洛阳城北^④。北郊坛的形制为方坛、四陛。祭祀对象除了后土神外,还有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等神,并以高皇后配祀^{[8]3181}。

三、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一)刘秀营建洛阳城的理念

刘秀是在原洛阳城的基础上营建都城的,由于受原城址所限,其整体布局并不完全符合传统都城的礼制规划,但在某些方面也是按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进行增建的。

东汉洛阳城平面形状不符合《考工记》所说的“方九里”,而是继续沿用秦汉时期的南北长方形旧城垣。虽不是“旁三门”,但东、西城墙则是

开设三门,南城墙最初也是三门,后来刘秀为了去城南进行郊祀,才于建武十三年(37年)开设平城门^⑤。经对城门的钻探和发掘得知,城门是一门三洞^[7,10],此虽是北魏时的城门建制,但其是在汉晋城门的基础上修缮建成的,东汉时的城门也应是一门三洞。三门洞通往城内的道路应为并行三条,因不是四面对称的“旁三门”,形不成《考工记》所说的“九经九纬”,但“洛阳城门依魏晋旧门,……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11]，“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⑥。此皆符合都城规划礼制。《续汉书·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此正是大朝居中,“左祖右社”之制。这些规划均符合《考工记》所载的古代都城传统建制。

(二)洛阳城的宫殿建制

南宫和北宫是洛阳城内两组主要的建筑群。学界对两宫的主次关系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南宫是主宫^[12];有的认为北宫建成后成为主宫^[13];还有的认为两宫难分主次^[14]。刘秀定都洛阳,“幸南宫却非殿”,此肯定南宫是大朝正宫。《续汉书·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刘秀称帝第二年,就以南宫为正宫,在其左右分建宗庙和社稷,遂成“左祖右社”的格局,此正体现了南宫为正宫的地位。

明帝重建北宫后,南宫仍然是大朝正宫。查阅《后汉书》记载,新皇帝即位之礼均在南宫。只是少帝刘辩时,朝内争斗厮杀于南宫,南宫被袁术烧毁^{[6]2252},最后献帝只能居于北宫。可见,南宫始终是东汉王朝的大朝正宫。

南宫建制体现阴阳五行观念。对于南宫形制的复原,有学者复原为正方形^[15],有学者复原为南北长方形^[16]。由于目前对南宫的具体位置还没勘查清,究竟南宫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还没有定论。但从文献记载看,南宫应体现了阴阳五行观念。

《后汉书·百官志二》:“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对“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的标点,历来不好解释。现有学者将

其标点为：“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并指出：“‘平城门北宫门’，意思就是平城门北边的宫门，那个宫门与平城门相对而在北边。”^[17]此处的“北宫门”实际是指平城门北面的南宫南门。蔡邕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6]3274}正因为平成门与南宫南门是相连的，所以此二门均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

南宫南门名端门，应是仿照西汉未央宫而设的。《史记·吕后本纪》载：“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遂入而听政。”此述汉惠帝崩后，汉文帝以代王身份通过端门进入未央宫即皇帝位。颜师古注“端门”为“宫之正门”^{[4]1374}。南宫端门也有似于周之内朝路寝之门。《周礼·夏官·太仆》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郑玄注：“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门下矣。”郑玄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家，其以当朝之端门有似于周之“路寝”之门，足证南宫为正朝，端门为南宫之正门。

综上所述文献所记，南宫南有端门，东有苍龙门，北有玄武门，唯独没有西门的记载。但倡导经学、遵从礼仪的东汉王朝应该不会缺失西面的白虎门。有学者根据《续汉书·五行二》载“南宫云台灾，……延及白虎、威兴门”推断南宫西面也有白虎门^[18]。由此可见，南宫是四面辟门的，其分别名之青龙、白虎、玄武，南门虽不名朱雀门，但北宫南门则名朱雀门。由此可见，南宫大朝前殿位居中央，四神守护于宫之四方，这一切建制均是遵循阴阳五行的理念。

（三）洛阳城的“左祖右社”建制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续汉书·祭祀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刘秀于建武二年以“左祖右社”的传统建建立高庙和社稷，肯定是在南宫的东西两侧。但李贤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上东门是洛阳东城墙最北部的门，刘秀更改此前自己所遵循的传统建制而将社稷移至上东门内，明显不太合理。此为后人注释，是否属实，值得怀疑。目前宗庙和社稷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还有待今后

的考古工作加以证实。

东汉光武帝刘秀出自西汉宗室，自称是承袭西汉的帝统。所以东汉王朝建立后，在洛阳建立西汉宗庙的同时，也在长安修复了高庙，形成了东庙和西庙。东汉皇室多次对西庙进行祭祀。

刘秀在洛阳所建高庙，其所祭祀神主先后反复了多次。最初，光武帝于建武二年立高庙于洛阳，“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6]28}。建武三年（27年），刘秀“立亲庙洛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春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8]3193}。至建武十九年（43年）有大臣再次提出立刘秀四亲庙于洛阳之事，由于刘秀四亲庙与洛阳高庙诸帝存在帝统的问题，其四世祖神主无法作为皇帝纳入高庙。另外，刘秀与西汉诸帝也存在辈分上的问题，刘秀为高祖九世之孙，成、哀、平三帝辈分都在刘秀之后。因此有大臣反对立刘秀的四亲庙于高庙中。于是刘秀最后决定，洛阳高庙祭祀汉高祖（太祖）、汉文帝（太宗）、汉武帝（世宗）、汉宣帝（中宗）及汉元帝五帝，成、哀、平三帝纳入长安高庙祭祀。京师洛阳也不立刘秀四亲庙，而就南阳陵园庙祭祀^{[8]3194、[19]86}。这种庙制到刘秀死时举行丧葬之礼又出现问题，按丧葬之礼，葬后要举行“班祔”之礼^⑦，将新死者的神主以昭穆次序入庙。刘秀死后，明帝“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是“再受命”之祖，尊庙号曰“世祖”^{[8]3195}。然洛阳高庙中已有“太祖”“太宗”“世宗”“中宗”之庙，就不好将再受命的刘秀“世祖”之庙纳入高庙中；将刘秀神主祔于南阳的祖坟陵庙也不合适，因四亲祖均各自为陵庙；刘秀的原陵又不设陵庙。这样，刘秀的神主只能安置于陵寝中进行丧祭之礼，如此则形成了从明帝开始至刘秀原陵举行的“上陵礼”。刘秀的世祖光武帝庙则是在刘秀死后三年即明帝永平三年才建成投入使用^⑧。明帝以后，东汉诸帝皆“尊俭无起寝庙”，神主均藏于世祖庙中^{[8]3169}，形成了诸神主一庙“共堂”的宗庙建制^⑨。这样，都城洛阳便有了高庙和世祖庙两处宗庙，明帝以后诸帝新即位均要到高庙和世祖庙进行拜谒，以成即位之礼。

（四）东汉太学建制

太学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武帝献策曰：“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4]2512}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兴太学”^{[4]212}。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始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生)、《礼》后(苍)、《易》杨(何)、《春秋》公羊而已”^{[4]3620-3621}。此五部今文经立为官学,在太学里进行讲授^①。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亲自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宣帝)亲称制临决焉”。石渠阁会议结束后,宣帝于黄龙元年(49年)增立梁丘氏《易》、大小夏侯《尚书》和穀梁《春秋》四家博士^{[4]272},加上原有“五经”博士八员,共计十二博士:齐、鲁、韩《诗》,欧阳、大、小夏侯《书》,后苍《礼》,施、孟、梁丘《易》,公羊《春秋》,穀梁《春秋》。至此,官定太学博士员十二人,称黄龙十二博士^②。由此,今文经学大盛。至王莽托古改制,遵从古文经,于是设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等古文经博士^③,并于元始四年(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4]4069}。王莽所建太学位于汉长安城南郊,与明堂、辟雍、灵台在一个大的范围内。

东汉初年,刘秀重建太学博士制度。《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所立十四博士皆为今文经。光武重置博士,为恢复太学做了必要的准备。建武五年,光武帝巡视于鲁,并使大司空祠孔子。还都洛阳后,便“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6]1606}。重新开启了经学在太学中的讲授。顺帝时,又扩建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至质帝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人^{[6]2547}。东汉太学成为传授经学的中心。

至东汉后期,由于受“党锢”事件的影响,经学出现衰落的趋势。质帝之后,“章句渐疏,而

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尤其是桓、灵时期,激烈的“党锢”事件使太学士人蒙受劫难,“党人既诛,其高明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6]2547}。这说明太学制度已被破坏,经学也处于混乱之中,甚至出现了篡改、伪造经文的行为。对于这种混乱的经学形势,有识之士便倡议整顿太学,确立正确的经学体系。

正定经学是自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开始的。曾校书于东观的议郎蔡邕指出,“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七人联名向灵帝“奏求正定六经文字”^{[6]1990}。灵帝采纳蔡邕等人的建议,于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6]366}。蔡邕乃选定正确经本,“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6]1990}。可见此时经学恢复之势。但仅过七年,董卓烧毁洛阳城,太学随之荒废,石经惨遭摧残,东汉一代的太学经学也就结束了。

关于熹平所刻经卷数,文献记载歧异,《灵帝纪》为“五经”,《蔡邕列传》为“六经”,《隋书·经籍志》则记“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近人王国维考证,实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与《公羊传》《论语》二部^{[20]955},为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关于所立碑的数目,《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洛阳记》的记载,其碑总数为46枚。熹平年间刻的石经后世称为“熹平石经”,因是用隶书一种字体所刻,又称“一体石经”。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在东汉太学旧址上重修太学,齐王曹芳于正始年间(240—249年)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尚书》《春秋》两部儒家经典,史称《魏石经》,又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经考古勘查,太学遗址应在洛阳故城南郊今太学村一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太学村北围墙北侧进行发掘,出土汉石经残块661块,有字残石96块。有字残石所载内容,包括《仪礼》《春秋》《鲁诗》《论语》以及《仪礼》校记、《鲁诗》校记等^[21]。在出土汉石经的西北部发现魏晋以降的太学遗址,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50余米,南北约220米。其中发现一排排布列规整有序的长条形房舍,

应是沿用了东汉太学诸生房舍的结构和形式。在魏晋太学遗址东西两侧,仍有一些长条形房舍遗址发现。因魏晋太学是在东汉太学的基础上重修,说明东汉太学遗址正在此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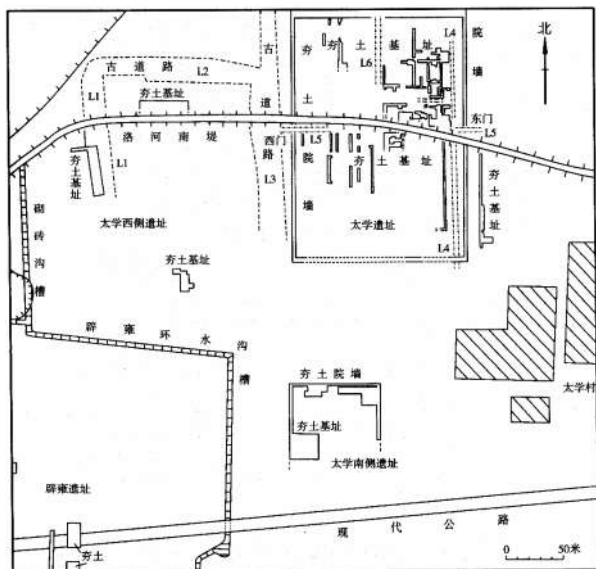


图2 太学遗址勘探平面图

(五) 东汉辟雍建制

辟雍之制始于周代。《诗·大雅·灵台》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22]525}又《诗·大雅·文王有声》曰：“镐京辟雍。”^{[22]527}西周早期的麦方尊铭也记有周王在辟雍行礼之事：“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豊。”^[23]周之辟雍乃周王举行礼乐活动的地方。两汉都城南郊均建有辟雍，为汉朝皇帝行礼之处，“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24]。西汉成帝时，刘向曾建议兴建辟雍：“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成帝听从刘向建议，计划建辟雍于长安城南，后遭成帝崩，“营表未作”^{[4]1033-1034}。王莽托古改制，“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建辟雍于长安南郊。东汉“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乃于建武中元元年建辟雍于洛阳城南。明帝即位，躬行其礼，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并于永平二年(59年)“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6]102}。东汉诸帝是在辟雍中行射礼和养老礼。

《续汉书·礼仪上》记载了“养三老、五更之仪”：先选三公老者一人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

者一人为五更。其皆服礼服，持玉杖，斋于太学讲堂。行礼当日，皇帝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三老、五更行三揖之礼：于门屏，行交礼，揖，导引进门；进门后，揖，导引三老、五更行于右，天子行于左；至阶，揖，天子升自阼阶于堂，三老升自宾阶于堂，面东^③。接下来，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自割牲，执酱、执爵献三老。献礼毕，进行“和乐”之礼^④，“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6]102}。至此，养老之礼结束。第二天，三老、五更“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8]3109}。根据东汉举行养老礼之仪节，也可推断出辟雍礼殿的建筑格局。“万舞于庭”，说明礼殿坐落于庭院之中，庭院正面辟门，门前有屏，屏外有阙。行礼之大殿呈前堂后室，东、西厢格局，堂前有阼阶、宾阶。

1930年曾在城南大郊村发现晋武帝三临辟雍的纪念碑，后又发现碑座，可证辟雍遗址位于城南大郊村一带^[9]。经考古勘查和发掘得知，遗址范围约370平方米，遗址中部有一大的殿基，殿基四面各有一组建筑，每组皆由左右二阙和双阙内侧的门屏组成^{[25]228-244}。由此推断，此整体建筑应是四向的，其中心殿基也应是四向的。由于殿基破坏严重，中心建筑礼殿的格局已无法搞清。根据上文养老礼仪的论述，推测中心殿基应是“四向五室”的建筑格局，即每面均是前堂后室、东西两厢结构，前堂设阼阶、宾阶，四向之中为太室。辟雍是以“五行”理念而建的礼制性建筑。

前引《白虎通义·辟雍》记载：“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但此辟雍遗址环水并不是圆形，其水源通过遗址北部一条砖砌涵洞自北面到达遗址北部正中，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分流，各流出180余米后折而向南，直到遗址以南，尚未显出转折闭合的迹象。由此可确认，此辟雍遗址的环水并非圆形，与《白虎通义》的说法不同。《白虎通义》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下诏在白虎观召开会议，评议“五经”同异，由班固整理编辑而成。为何该遗址形状与当时文献的记载不一致？是否“璧圆”是指中心建筑建于圆形的台基之上“以法天”，而不是指“环水”？此北部水源由遗址东、西两侧由北而南畅流，也可谓“于雍水，侧象

教化流行”。当然,此问题还可深入研究。

(六) 东汉明堂、灵台建制

关于明堂建制,较早文献《逸周书·明堂解》《考工记·匠人》《礼记·明堂位》《大戴礼记·明堂》等均有记载,但多歧异。正如王国维所说:“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记·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大戴记·盛德篇》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20]¹²⁵ 东汉蔡邕则说:“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8]³¹⁷⁸ 清代惠栋综合前人之说作《明堂大道录》,将明堂复原成更为复杂的多功能建筑^[26]。其实,两汉文献所讲的明堂,均是古、今文学不同学派以阴阳五行学说附会而成的明堂,惠栋并没有超出汉代各家之说。顾颉刚先生对惠栋之说提出质疑:“读惠栋《明堂大道录》一书,此制诚无代蔑有,亦无所不包矣。然自今日观之,则犹为一必当怀疑之问题也。……《月令》式之明堂,乃阴阳家言之集中表现与其最后成就,全出理想,不必以事实求之者也。”^[27] 并指出,明堂在“古代只是一个朝南的大礼堂,是集众开会之所,本不神秘,但经汉儒的鼓吹,则与辟雍、灵台合而为一,为帝王所专有”^[28]。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屋建筑,均没有发现“四向”五室或九室布局者,只能是如顾颉刚先生所言的“开会之所”。

西汉时,汉武帝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3]⁴⁸⁰。从公玉带所献明堂图看,其主体为一“四面无壁以茅盖”的建筑,此所谓黄帝时明堂,并没有明显的“五行”观念之色彩。但待泰山明堂按照公玉带所献图修成后,武帝“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座,令高皇帝祠坐对之。……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3]⁴⁸⁰⁻⁴⁸¹。由此观之,武帝在泰山明堂是用于祭祀太一、五帝之神,以

高皇帝配祀。从祭祀序位上看,太一居中央,五帝“各如其方”,此已显露出五帝、五方、五色的“五行”观念。不难看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并以这种思想统辖万事万物的发展。至王莽时,遵从古文经,于都城长安南郊建明堂,遂形成“四向五室”的建筑格局^[29]。

据勘查,东汉明堂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建有夯筑围墙,东、西、南三面围墙墙基犹存,每面墙约长400米。围墙之内,中心部位为一平面呈圆形的夯土建筑基址,直径61至62米。在圆形夯土建筑基址边缘处,犹有包砌青石被拆后留下的环状沟遗迹。圆形建筑基址之上的建筑遗迹已毁坏不存^[25]²⁴⁰(图3)。根据此残留的遗迹现象推测,东汉的明堂应如经学家所云,是“上圆下方”的建筑。由于圆形建筑基址之上的主体建筑遗迹不存,无从得知主体建筑的真实结构,如以东汉盛行今文经,其是否呈今文经所主张的四向九室十二堂之格局。杨鸿勋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将东汉明堂复原成三层建筑,底层为每面三堂,四面共十二堂;中层每面二室,四面共八室;上层中央为太室,此正符合今文学派所主张的四向九室十二堂格局。杨先生的见解也可备一说^[30]。

关于东汉明堂进行何祭祀之礼,《后汉书·祭祀志中》有记载:“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这是东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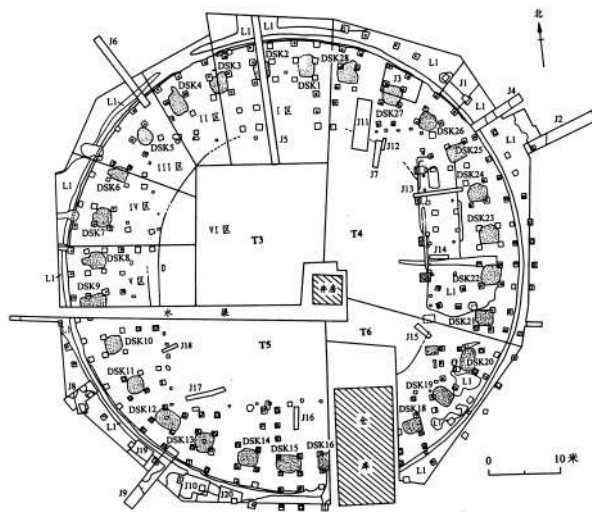


图3 明堂中心建筑基址平面图

堂建成后第一次进行祭祀之礼,祭祀的对象是五帝,以光武帝配祀。祭祀礼仪完成后,则“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李贤注云:“元气,天气也。王者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也,故望之焉。”以观天象吉凶、水旱、丰荒、灾疫之变。此后东汉皇帝在明堂的祭祀均是遵从此礼仪。由此看出,东汉在明堂均是于每年正月祭祀五帝天神,然后登云台观天象,明堂与灵台是连续进行礼仪活动的建筑。

灵台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一西一东夹道相对。遗址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围墙,每边长200米左右,中部是一座50平方米左右的台基,残高约8米,顶部已塌毁,文献记“上平无屋”,是一个方形的平台。台基四面各辟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每面有回廊式建筑。上层平台每面有五间建筑,东西南北四面墙壁分别涂有青、白、朱、黑四色,是以四神代表四个方向设计的。另外,上层平台西面五间建筑的后面,又加辟五间内室。据此推测,其可能是“张平子(张衡)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密室”^[25]237-240(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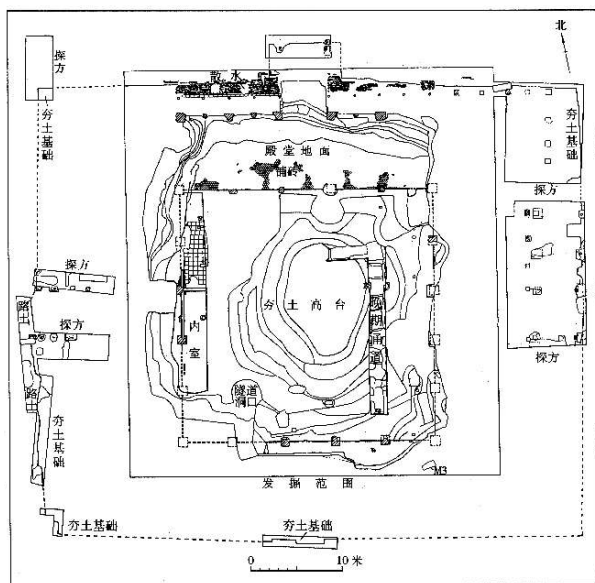


图4 灵台中心建筑基址平面图

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表明,东汉的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分立的。然而,前引东汉蔡邕《明堂论》则认为,青庙、太庙、明堂、辟雍、太学是“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蔡邕是东汉人,应当知道当时礼制建筑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他所说的与实际情况不一样。其实,蔡邕是综合了先秦两汉文献对明堂的各家众说,将其统一复

合到东汉明堂之中,描绘成了一座无所不包的礼制建筑,所以其称“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

总之,东汉都城洛阳已形成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此后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注释

- ①对洛阳城进行复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王仲殊:《东汉的都城(雒阳)》,载自《汉代考古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21页。段鹏琦:《东汉洛阳城遗址》,载自《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344页;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徐龙国:《东汉洛阳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载自《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九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331页。②《后汉书·何进传》载:“(中平六年八月)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阁闭。……会日暮,(袁)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续汉书·百官三》载:“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③《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④《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⑤《续汉书·百官二》载:“南屯司马主平成门。”刘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开此门。”⑥《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⑦《仪礼·既夕礼》载:“卒哭,明日以其班祔。”⑧《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⑨《隋书·音乐志》载:“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后,始立共堂之制。”⑩《汉书·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只说了《书》《礼》《易》《春秋》四经,而缺《诗经》。其实前文记载,韩《诗》于文景时已立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诗》、鲁《诗》间殊,然归一也。”⑪《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⑫《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⑬凌廷堪在《礼经释例》载:“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曲,揖;当碑,揖。谓之三揖。”《凌廷堪全集》(壹),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8页。⑭凌廷堪的《礼经释例》载:“凡乐皆四节,初谓之升歌,次谓之笙奏,三谓之间歌,四谓之和乐。”《凌廷堪全集》(壹),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75页。

参考文献

- [1]王春法.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179.

- [2]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2127.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J].考古学报,1998(3):361-404.
-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J].考古,1973(4):198-208.
- [8]司马彪.续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J].考古学报,1955(9):117-136.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8(9):814-818.
- [11]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9.
- [1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C]//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44-253.
- [13]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9.
- [14]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6.
- [15]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
- [16]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J].考古,2003(7):629-639.
- [17]张明华.东汉南宫考[J].中国史研究,2004(2):25-35.
- [18]陈苏镇.东汉的南宫与北宫[J].文史,2018(1):5-24.
- [19]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86.
- [20]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J].考古,1982(4):381-389.
- [2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276.
- [24]班固.白虎通义[M]//程荣.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163.
- [25]段鹏琦.东汉洛阳城遗址[M]//刘庆柱,白云翔.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26]王先谦.清经解续篇: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8:801.
- [27]顾颉刚.史林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63:146-149.
- [28]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99.
-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98-200.
- [30]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319-330.

A Study on the Ritual Culture of the Capital Luoya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Gao Chongwen

Abstract: Liu Xiu made expansion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Luoyang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capital etiquette system. The Nangong Great Court is in the middle, the temple and She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on the left and right, formally forming the layout of “Left ancestor and right She”. The temple system changed the decentralized tomb temple syste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imply centralized temple system in which all emperors and gods had one temple and “sharing the same hall”. The south palace has four gates in each direction, which named Qinglong, Baihu and Xuanwu respectively. The south gate is named Duanmen,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Road Sleeping” gate of Zhou dynasty. These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and five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he avenue in front of Duanmen, through the Pingcheng Gate of Nanyuan, leads directly to the ritual architecture complex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and becomes the ritual royal road to the south of the main palace, which is under the unified control of Nangong Nantun Sima. The Mingtang, Lingtai, Biyong and Taixue have their own uniqu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 The Mingtang is used to worship the Five Emperors, the Lingtai is used to observe the celestial phenomena, the Biyong is used to hold archery and endowment ceremonies, the Taixue is used to teach the classics, and the ritual architecture complex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becomes the center of etiquette propaganda. Sacrifice to the sky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and to the earth in the northern suburbs has become the custom of the capitals of all dynasties. Luoya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pened a typical model of ancient capital etiquette civiliza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apital etiquette civilization in later dynasties.

Key words: capital Luoya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eft ancestor and right She; Mingtang; Biyong; Taixue

[责任编辑/云 扬]